

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

“商周青铜器铭文的文学研究”（09YJA751001）最终成果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

商周青铜器铭文文学研究

◎ 丁 进 /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

“商周青铜器铭文的文学研究”（09YJA751001）最终成果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

商周青铜器铭文文学研究

丁 进 /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商周青铜器铭文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从写作学角度看,它们是中华私人化写作的滥觞。本书考察了商周青铜器铭文创作历程,归纳出晚商青铜器铭文创作的五种基本模型,发现西周青铜器铭文创作是在这五种模型基础上对其中几个要素的拓展,从而将青铜器铭文创作推向鼎盛。本书还考察了西周分封、约剂 and 兵戎类铭文创作技巧的演进,分析了商周青铜器铭文记时方式,重点研究了铭文的记言艺术、仪式记叙、叙事技巧和写人艺术,认为发展到周康王时期,青铜器铭文仪式记叙已经成熟,“器主曰”带有拟言性质,“王若曰”属于言语的二次引用,“蔑历”是一种表彰仪式,“对扬王休”不是仪注记叙。西周铭文使用了叠叙、联陈、补叙、转题、视角切换、合叙、喻叙和仿诗等叙事手法,丰富了中华散文写作技巧。此外,为了准确把握青铜器铭文的写作艺术,本书对铭文的释读作了深入研究,对于《利簋铭》、珣生三器铭等作了全新的解读,对困扰学术界的“蔑历”“对扬王休”“初吉”“王若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商周青铜器铭文文学研究/丁进著.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7-5604-3310-3

I. ①商… II. ①丁… III. ①青铜器(考古)—金文—研究—中国—商周时代 IV. ①K877.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32508 号

商周青铜器铭文文学研究

作 者:丁 进

出版发行:西北大学出版社

地 址:西安市太白北路 229 号

邮 编:710069

电 话:029-88305287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陕西奇彩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15.5

字 数:347 千字

版 次: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04-3310-3

定 价:32.00 元

序

读丁进《商周青铜器铭文文学研究》书稿,启益颇多,很为作者高兴。书稿篇幅不算多,却能感到沉甸甸的学术含量。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研究获得解放,有关青铜器铭文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主要工作大多集中在文字隶定和考释、对于铭文历史认识价值的揭示方面。这些基础研究工作当然很重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已经不满足于已有的发现,商周青铜器铭文所包蕴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尚有诸多方面未被发现或发掘出来。因此学界今后将如何把有关青铜器铭文研究引向深入就成了现实存在的问题。商周青铜器从工艺制作到铭文书刻,都可以作为文物古董陈列于博物馆,让人近距离观赏到,人们已熟悉了古代青铜艺术,而青铜器铭文作为文学作品还没有被人广泛认可。青铜器铭文作为一种表现了当时贵族精神文明的高雅文学创作,不仅有大量的长短体制不一的散文,同时还有少量的韵文,它们不仅记言叙事,而且也表情达意,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历史风貌和人的精神气象,这当然是当时一种重要的文学创作形式。但是作为高雅文学,却被现代学人所冷落,今天的文学史著作大多不予收录评介,人们也少有阅读和欣赏的兴趣。把商周青铜器铭文的创作拒之于文学殿堂之外,这样做公平吗?我们不能不说这是现代人认识上的局限,这种局限于学界所形成的现代僵化的纯文学观念有关。如果完全运用由西方输入的纯文学概念来衡量,不用说青铜器铭文,连《尚书》和《左传》,甚至《诗经》中的雅、颂篇什都很难说是“文学作品”。唐宋八大家中韩愈的《师说》、柳宗元的《封建论》也与今天所谓的纯文学无关。丁进注意到了问题的关键,他结合中华民族传统的杂文学观念重新审视上古时代的青铜器铭文创作。作为一个先进者,在广博的综合研究基础上,丁进对青铜器铭文的考察重点就逐渐转移并落实到对青铜器铭文的文学性质、特征、技法运用、影响和贡献诸方面的探索上,努力揭示青铜器铭文的美学价值,并给人充实的文学审美享受,这是丁著不同于一般青铜器铭文研究著作的地方。系统研究商周青铜器铭文文学创作的著作今天并不多见,我们大胆推论,丁著将以其开拓性而功在学林。

在青铜器铭文的文学思考方面,丁进的研究颇为细腻、深刻。作者并非孤立地就文章论文学,而是在广博的经、史综合大背景中对青铜器铭文展开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其间克服了种种难以超越的困难与障碍,爬罗剔抉,日以继夜而无怨无悔。他将商周青铜器铭文的创作置于中国文学史、特别是散文发展史的全视野中进行考察,力图对当时的铭文创作进行较为全面的文学总结,重点研究了商周青铜器铭文因其所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特

殊阶段而构成的特定写作模式,并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学风貌和特点。作者在大量作品事实的基础上,由归纳抽象到具体分析,层层演进,细加梳理,具体而生动地探索了青铜器铭文学创作的诸端文学技巧,如叙事技巧、记言艺术、仪式铺垫和写人艺术及其心理展现等,认为两周青铜器铭文在继承晚商铭文基础上有了很大的突破和创造,极大地丰富了铭文的艺术表现,如使用叠叙、联叙、补叙、转题、视角切换、合叙、喻叙、仿诗等叙事艺术手法,丰富并发展了中华散文艺术,从而迎来了青铜器铭文学创作的黄金时代。这就为中国文学史著作补苴罅漏,为先秦散文史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成果。

本书另一特点是作者结合经、史,特别是“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之学,来具体揭示隐藏于青铜器铭文的秘密,这就是说,作者把有关铭文的文学研究安放到特定历史背景,特别是经学史——两周礼乐文明的大视野中去作学术考量与思辨,因此,作者对铭文疑难问题的辨析绝非空穴来风的胡猜,而是在历史大背景下的动态思考,其研究与探索是立足现实而根基坚牢。尽管现在国人开口国学,闭口经学,热闹得很,但实际上真能搔到国学痒处者并不多。为什么?怕难、怕苦,急于求成而少做基础研究功夫,对经学史、特别是其中的“三礼”之学,更因艰深枯燥而视为畏途,避之唯恐不及。但丁进反之,他洞悉礼学对青铜器铭文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此知难而上,特重“三礼”之学,他在这方面下了苦功夫,打下比较坚实的经、史的学术基础。这就让他在青铜器铭文研究中获益匪浅,有条件窥见了礼乐文明母体中所孕育的铭文婴儿的真实面貌。两周之礼内容丰富而复杂,其中包含了礼俗、礼器(按:青铜器即重要礼器之一)、礼制、思想观念等层次。礼俗是社会风俗方面的周礼;礼器是周礼文明的物质载体;制度是当时礼乐文明的规范,是形成文字的礼俗规定,当时之人必须遵守;思想观念则是两周礼乐文明及其礼俗制度的思想论证和演绎。在两周之时,礼乐文明的重要性虽然有变化,但其规范作用与影响都无处不在,不是可有可无的花瓶摆设。这一礼乐文明影响了先秦古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成为中华早期文学艺术的母体。试问,如果《诗经》研究离开了周朝礼乐文明的母体,那么无论是风、是雅、还是颂,都一样脱离了历史的生活真实,那还有什么意义呢?同样,我们考察青铜器铭文,实际上也离不开礼乐文明母体。丁进的研究首先考察的就是这种“母子”关系。这不是人们习以为常的经学与文学的并列模式,实际上是在礼乐文明母体诞育铭文学本身的内部研究。在注意和关心把青铜器铭体文学从周礼母体中剥离出来的同时,又将其文学创作和文学因素还原到它所依托的礼乐文明体系中去考察它的产生、传播、使用、影响等,这样的工作非常必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弄清楚金文铭体文学是如何从礼乐母体中脱离出来,从而成长为独立的艺术形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描述出文学发展的运行轨迹。这不是文学的内部研究又是什么?因此,现有出土的金文考古资料并非仅是出土的历史文献,同时更是具有鲜活文学生命的创作实践。作者对“三礼”之学长期关注和持续研究,获得深厚的学术积淀,为其青铜器铭文的文学研究夯实了基础,并增添了许多亮点。

十余年前,丁进负笈游沪,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我俩有师生之谊。毕业后,又不

断有问讯交流,彼此切磋学问,乐在其中,以此成为知友。我俩都是教师,教师的最大幸福就是学生的成长与成才,早早超越老师而成为国家栋梁,这就是老师心底的愿望。韩愈云:“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这句话千真万确,完全符合教学相长的道理。老师痴长几岁,早走几步,在前引路,随后就是莘莘学子的激流勇进,阔步向前,准备攀登学术金顶。从这角度说,老师培养了学生。但从另一视角言之,在教学中学生给老师以启发和反哺者不乏其例。老师知识或许广博一些,但也有所限,常有知识盲区,在与弟子反复切磋讨论中,时常因学生的启迪而有顿悟,灵光闪现,从而填补了某些学术空缺,就我的教学经验来看,这是言之有故,事实俱在,今读丁进大著,信然。

拉杂一通,不知读者然否?是为序。

蒋 凡

2013年8月酷暑于海上望珠楼半万斋

目 录

第一章 商周青铜器铭文的性质	(1)
第一节 商周铭文创作情况概述	(2)
第二节 青铜器铭文写作艺术研究现状	(13)
第三节 商青铜器铭文的私人著述性质	(22)
第四节 本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27)
第二章 铭文写作模式的建立和突破	(31)
第一节 晚商铭文的写作模式及其在西周的发展	(31)
第二节 晚商写作模式的继承与突破	(45)
第三节 写作身份的转变——从史官写作到私人写作	(50)
第三章 西周铭文记叙艺术	(67)
第一节 分封铭文写作艺术	(67)
第二节 约剂铭文写作艺术	(75)
第三节 兵戎类铭文写作艺术	(89)
第四章 铭文记时研究	(101)
第一节 铭文的时间观念	(101)
第二节 “初吉”问题	(109)
第三节 既望、既生霸和既死霸问题	(117)
第四节 铭文记时艺术	(121)
第五章 铭文记言研究	(127)
第一节 铭文记言技术的演进	(127)
第二节 “器主曰”的性质:从言语记录到拟言	(136)
第三节 “王若曰”研究	(148)
第四节 铭文记言方式	(160)
第五节 铭文的记言功能	(165)
第六章 西周铭文的仪式记叙	(168)
第一节 “蔑历”问题	(168)
第二节 “对扬王休”问题	(179)
第三节 册命仪式记叙	(185)

第七章 铭文的叙事技巧研究	(191)
第一节 繁叙	(192)
第二节 变叙法	(200)
第三节 曲叙	(204)
第八章 西周铭文写人艺术	(207)
第一节 人名与称呼	(207)
第二节 政治人物性格塑造	(212)
第三节 英雄人物形象塑造	(226)
引用文献	(235)
后记	(240)

第一章 商周青铜器铭文的性质

本研究首先遭遇到以下挑战:商周时代有“文学”吗?商周青铜器铭文能够称之为“文学”吗?那种形式上高度模式化的铭文能够与诸子散文、历史散文相提并论吗?商周青铜器铭文的“文学研究”是否有意义?

很多学人都会因此而困惑,我们在展开研究之前,有必要对这些问题作简要说明。

就艺术技巧的多样性来说,青铜器铭文当然不如先秦诸子散文和部分历史散文那样丰富;不过商周青铜器铭文是与《诗经》中雅、颂同时代的“私人化写作”的作品,是我们今天能够直接看到的三千年前中华先人手写真迹,毫无疑问,它们是中华文章的鼻祖,与《诗经》一起,一诗一文,构成中华早期文学的双璧,理应受到我们如同对待《诗经》那般的珍爱。商周青铜器铭文的创作实践积累了大量的散文写作经验,探索出了一系列写作技巧,在史官“公文”写作之外,形成了长达千年的“私文”写作传统,如《天亡簋铭》《利簋铭》《何尊铭》《宜侯矢簋铭》《散氏盘铭》《迷盘铭》《班簋铭》《毛公鼎铭》《晋侯苏编钟铭》等,这些作品大多庄严典雅,形成了影响深远的美学风格,至今仍然是审美范畴“典雅”的标准样本。毫无疑问,商周青铜器铭文属于它们自己时代的“文学”,这一点无论今人是否赞成,都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对于铭文文学价值认识不足的原因主要来自今人铭文阅读的障碍。今人对于上古语言文字已经比较隔膜,“陌生感”削弱了我们对于铭文的欣赏兴趣。今天的中国文学研究有必要揭去覆盖在铭文之上的这层“隔膜”,让今人欣赏到古人的写作艺术。对于长达千年的铭文写作经验和写作技巧的揭示与总结,将有利于我们了解商周时代写作艺术的真实状况,以及它们对于古代散文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有利于理清古代文学发生、发展的脉络。商周青铜器铭文本身就是一笔十分丰厚的遗产,这份遗产完全有资格召唤文学研究者投入更多的精力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商周青铜器铭文与先秦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的关系,我们想作这样的比方:商周青铜器铭文与《尚书》类散文作品是夫妇关系,与诸子类散文则是母子关系。《尚书》类“历史散文”属于官方“公文”性质的作品,是当时社会“主流”写作,是担任公职的“丈夫”;青铜器铭文创作是一种时尚性写作,更接近文学,是“私文”,是治家的“妻子”。青铜器铭文写作的私人性质,为春秋战国时代诸子散文的兴起铺设了道路,代际关系十分明显。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视商周青铜器铭文为诸子散文之母。

“中国文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还是上世纪初的事情。正如我们在《再续中国经学学术传统》一文中所说,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策略是文学理论、文学作品和文学史三足鼎

立,共同构成中国文学学科。^① 这个转型深受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文学作品”四分法能够将古代——特别是秦朝以后绝大多数诗文囊括在内,不过也留下少量的尾巴:例如对于商周青铜器铭文处理起来还是比较棘手。大多数文学史将它们放在“先秦文学”的“散文”范围内,不过与“历史散文”“诸子散文”和“神话”相比,大部分文学史关于商周青铜器铭文的叙述所占比率几乎微不足道。考虑到晚商西周铭文本身的写作成就以及它们对于春秋战国以来散文写作的贡献,我们觉得有必要对于商周青铜器铭文的写作技术和写作成就作更加深入的研究。

青铜器铭文创作从殷商中晚期一直延续到战国晚期,创作历程长达千年之久,是人类青铜时代文学的奇葩,也是中华文化中独具魅力的瑰宝。商周贵族借方寸之地抒写个人的荣耀,表达世代绵绵不绝的愿望,从私人角度记录了那个时代贵族生活情景和思想感情,涉及史书失载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在官方文献之外另辟一条反映私人生活和社会事件的叙事途径。古代文学研究如果避开这些铭文不谈,这份宝贵的遗产仅仅被文字学家用来研究文字形体的演变,或者被历史学家当成原始材料在使用,那么铭文将与普通大众的距离越来越远,作为古代文章典范的价值就不能体现出来,因此商周铭文的文学研究迫切需要开创出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

第一节 商周铭文创作情况概述

殷人创造了辉煌的青铜文化,他们在青铜器物造型和纹饰方面已经登峰造极,留给周人发挥创造力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整体上看,周人在青铜器造型艺术方面的成就确实难以与殷人一比高下;但是周人却将殷人开创的青铜器铭文创作艺术发挥到极致。今天流传下来的先秦典籍,片言只语都弥足珍贵,商周青铜器铭文数量十分庞大,我们能够看到的有字器铭就达到 12000 多件,其中成篇铭文不下 1000 篇,称得上杰作的也不下 500 篇,随着新发现青铜器的不断面世,这个数字还在逐年增加。

我国铜器的普遍使用大约出现在龙山文化时期(BC2400—BC1700),在齐家文化时期(BC2000—BC1600)铜器的使用更是常见。^② 这一阶段相当于《史记》所描述的夏朝。不过青铜的普遍使用要到二里头时代(BC1600—BC1300),这就是人们乐道的“青铜时代”,相当于《史记》所记的商朝。据安志敏介绍,目前发现最早的有铭青铜器是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一件铜鬯,所刻族徽相当于“天囙”二字的合文。^③ 不过这个证据还是孤证,确切可信的铭文族徽出现在二里岗时期和殷墟一期,大致上属于早商到中商时期。到了殷墟二期,

① 丁进.再续中国经学学术传统[J].孔子研究,2008,1.

② 安志敏.试论中国的早期铜器[J].考古,1993,12:1110-1119.

③ 安志敏.试论中国的早期铜器[J].考古,1993,12:1114-1115.

有铭铜器数量骤增。^① 不过殷商青铜器铭文发展有一个从单字铭刻、多字短语到句子再到文章的演变过程,发展到商末帝乙、帝辛时期,成篇的铭文才逐渐增多。帝乙、帝辛时期具有文章规模的铭文目前发现的不下二十篇,三十字以上的就有《小子雺卣铭》《二祀邲其卣铭》《四祀邲其壶铭》《肆簋铭》《宰觶角铭》等。晚商铭文虽无鸿篇巨制,却奠定了铭文写作的基本体式,例如:

丙申,王赐荀亚鬲奚贝,在鬲,用作父癸彝。^②

《荀亚鬲角铭》只有十六字,内容却包括了时间、地点、事件和作器目的四个要素,尤其是作器目的“用作某人某器”,是青铜器铭文写作必备的要素,这个要素在千年的铭文创作中从未被舍弃过。

西周是青铜器铭文创作的极盛时期。为研究方便,我们暂且将西周铭文写作划分为三个分期。武成康昭四王时期属于西周铭文传统的确立期;穆恭懿孝四王时期属于铭文的发展期,夷厉宣幽时期虽为西周政治的衰落期,却是铭文创作的鼎盛期。以下我们对三个分期的青铜器铭文创作情况作简要介绍。

一、西周铭文确立期创作情况

我们以武王、成王、康王和昭王四王时期为西周铭文的确立期,其中武王、成王时期是西周铭文的萌芽期,经过康王、昭王时期的锤炼,一种完全有别于晚商时代铭文的新写作传统基本确立。这一时期铭文创作体现了西周贵族积极进取的精神面貌。

(一) 武王时期

武王在位时间很短,目前可以确定为这一时期创作的铭文只有《利簋铭》和《天亡簋铭》,它们都与武王伐商有关。《利簋铭》对商铭继承性虽多,却也标志了西周私人叙事的兴起。《天亡簋铭》显示了时代特征,创新性胜过了继承性,标志着新的写作范式已经形成,代表了武王时期铭文创作的最高成就。这两篇铭文在写法已经显示了对晚商铭文的突破性进步,特别是《天亡簋铭》,记叙手段比目前所发现的所有晚商铭文都复杂,写作技术已经超越了晚商铭文。

(二) 成王时期

目前能够确定为成王时期的铭文不下三十篇,代表作有《何尊铭》《保卣铭》《太保簋铭》《燕侯克盨铭》《荆子鼎铭》等十篇左右,其中《何尊铭》记载了周成王对小子何的一次训话。^③ 将记言这一手法带入铭文创作中,这是西周初期铭文创作的又一项突破,标志着

① 曹淑琴. 商代中期有铭铜器初探[J]. 考古, 1988, 3: 246-257.

② 马承源. 商周青铜器铭文选[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8, 3: 3.

③ 马承源. 何尊铭文初释[J]. 文物, 1976,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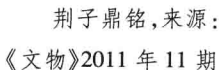


图 1-1

成王时期的铭文创作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突破了晚商铭文的藩篱,标志着周人已经能够在青铜器载体上充分发挥自己的写作才能。

康王时期是西周青铜器铭文创作的全面成熟期,西周铭文的主要类型都已经定型,铭文杰作明显增多。大封礼的代表作《宜侯矢簋铭》、册命礼的代表作《大盂鼎铭》、大献礼代表作《小孟鼎铭》、赏赐礼代表作《麦方尊铭》、祈福类代表作《它簋盖铭》、行政处罚类代表作

① 按:“𠂔”字发掘报告未作隶定。还写作“𠂔”字,也无考释。王占奎定为“戍”字,李天虹定为“未”字(笔谈76页)。而凡国栋在提交“楚简、楚文化与先秦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武汉)的论文《随州叶家山新出𠂔子鼎铭文简释》中指出宋华强以为释“刃”字(见该会议论文集)。涂白奎、黄锦前以该字是“荆”的雏形,见《随州叶家山M2所出荆子鼎铭文补释》,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696;网友“考古人”指出“荆子丽”就是《史记》中的楚王熊丽:<http://www.gwz.fudan.edu.cn/ShowPost.asp?ThreadID=5421>;陈小三全面论述了铭文中的荆子就是周武王时期的熊丽,《新出荆子鼎与武王克商的年代——兼论周武王时期的标准青铜器群》,见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776。).

②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发掘简报[J]. 文物, 2011, 11: 17.

作《师旂鼎铭》、家族宗法活动类代表作《叔趯父卣铭》均取得了很高的写作成就,一批优秀的铭文作家宜侯矢、孟、麦、师旂活跃在这一时期的写作舞台上。

宜侯矢簋1954年发现于江苏丹徒县烟墩山,该簋铭文今存一百一十九字,记载了康王改封虞侯矢到宜国为宜侯的历史事件,是大封礼的代表作,弥补了历史文献分封诸侯记载的不足。铭文记事显示了初步的细节描写能力,记言也详细缜密,有条不紊。

《大盂鼎铭》二百九十一字,是西周初期铭文中的长篇之一。铭文转录了康王册命孟的册命文,与《尚书》中周初诸诰可以互相印证。主体部分可以视为《尚书》中的一篇,算得上是古《尚书》的遗篇。这篇铭文奠定了册命铭文的写作模式:从被册命者的先祖协助文王、武王定天下说到被册命者的种种优异表现,再反复叮嘱以勉励册命者发扬先祖荣耀,恪尽职守,被册命者因此作器以纪念先祖,祈求多种福禄吉祥。这个模式一直到西周晚期仍然是铭文创作普遍效法的样板。

孟还传下来另外一篇杰出的铭文——《小孟鼎铭》,这是一篇奇文,完整记载了王朝一次大献礼的全过程,是到目前为止唯一能见到的记载大献礼如此详细的文献。铭文特别关注于仪注的描写,是春秋时期《仪礼》的先声。可惜传世铭文拓片缺损过多,小孟鼎原器也在“太平天国”的战乱中失踪,留下了巨大遗憾。

大、小孟鼎铭的作者孟是中国文学史上优秀作家,除了这两篇鼎铭外,尚有《孟爵铭》一篇二十一字,《孟卣铭》一篇二十二字。一人留下四篇作品,算得上是西周“多产”作家了。关于周康王时期重要的政治家孟这个人,史书上没有任何记载,四篇铭文显示孟是那个时代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孟通过个人的铭文创作,让自己获得了不朽的荣耀。

另一位重要作家是邢侯之臣麦。麦所作铭文有《麦方尊铭》《麦方鼎铭》《麦方彝铭》《麦盃铭》四篇。《麦方尊铭》虽只有一百六十七字,却是康王时期乃至西周铭文史上重要的作品。它从邢侯之臣麦的角度记载了邢侯改封、在宗周参加周康王饗方京之礼、接受周康王赏赐、回邢国归宁显考、赏赐臣属等一系列事件,时间和地点多次转化,叙事却从容不迫,展示了高超的记叙能力。

(四) 昭王时期

可以确定为昭王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不下五十篇。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重要铭文作家,最为突出的有作册矢令、中、柞伯等人。

作册矢令的传世作品有《矢令簋铭》《矢令方彝铭》《令鼎铭》。三铭各具特色,第一铭记载了矢令受到王后王姜赏赐的事情;第二铭记载矢令协助周公子明保完成“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上任工作情况;第三铭记载矢令在昭王的一次籍田礼之后与另外一位大臣奋进行脚力比赛并获胜受奖的情形,全铭情趣盎然,是西周少有的欢快之作,或可视为逸闻趣事类散文作品的先声。

中是深得昭王信任的大臣,《中方鼎铭》记载了中在昭王伐虎方之年曾经馈赠生凤给昭王,受到昭王的赏赐;《中卣铭》记载了中为昭王南征出使诸侯国、巡视道路的事情;《中觶铭》则记载中受到昭王赏赐的乐事。

柞伯是诸侯国国君,周公的后代。传世优秀作品有《柞伯簋铭》和《柞伯鼎铭》。柞伯簋铭记载柞伯在昭王举行的一次射礼中获胜,赢得奖品的趣事。而《柞伯鼎铭》则记载柞伯在围攻昏邑的战役中表现杰出,铭文充满英雄主义的豪气。

此一时期“器主曰”类铭文创作开始流行,代表作有《沈子它簋铭》等,我们将在“记言”一章中讨论。西周初器铭文创作在记言、记事、写作视角和叙述方式上作了可贵的探索,为中期铭文创作的繁荣期到来作了充分的准备。

二、西周铭文繁荣期创作情况

我们以穆王、恭王、懿王、孝王四王时期为西周铭文的繁荣期。这一时期铭文作家成批出现,赏赐铭文登峰造极,铭文创作反映了西周贵族阶层从积极进取到追求财富和享乐的精神面貌变化。

(一) 穆王时期

穆王时期铭文的第一个特点是赏赐铭文大量涌现。说明这一时期西周王朝社会安定,经济发达,财力雄厚,贵族普遍追求奢侈的生活。这些时代风尚在《邇簋铭》《长由盃铭》《刺鼎铭》《作册大方鼎铭》《丰尊铭》等铭文中均有所反映。

穆王时期铭文创作的第二个特点是铭文写作名家成批涌现。精于射术的小臣静留下《静卣铭》《静簋铭》《小臣静卣铭》三篇作品,记载了小臣静三次受到周穆王赏赐的喜事,说明周穆王对于射术和射术教育十分重视。录伯戣留下了五篇杰作。此人是一位能攻善战的将军,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受到周穆王的重用,参加了针对南淮夷叛乱的战略防卫,《录卣铭》和《录簋铭》反映了这方面的事迹。《录伯戣铭》还记叙了戣参加驱赶入侵戎狄战役。《戣簋铭》一百三十四字,记叙了戣率领王师对入侵之戎的一场取得了重大战果追击战。《戣方鼎甲铭》记载了王姜对于戣的赏赐,《戣方鼎乙铭》写的是戣为文母日庚作器的事情,极富有抒情色彩。《录伯戣簋铭》叙述了周穆王为戣举办的一次盛大赏赐礼。录伯戣一人留下了七篇优秀铭文,是西周铭文史上流传作品最多的作家之一。

穆王时期铭文创作的代表作还有《班簋铭》。《班簋铭》一百九十七字,前部分气势磅礴,有气吞山河的气概;后半部忧愤深思,意味深长。此铭所反映的历史事件就是穆王平定徐偃王叛乱的战役,传说中穆王八骏、驭手造父都是关于这次战役的传说。

穆王时期铭文创作第三个特点是赏赐和册命铭文写作的模式化建构已经完成,代表作是《廿七年卫簋铭》,如图1-2所示。

铭文的基本框架是:年月+月相+日干支+王在某+格大室+某佑某+王呼某册命或赏赐某+具体内容+某拜稽首和对扬某休+作某器+祈愿语。到了恭王时期,这个高度程式化赏赐和册命铭文作法取得绝对优势。



廿七年卫鼎铭,《铭文选》197 器

惟廿又七年三月既生霸戊
戌,王在周,格大室,既立,南
伯入,佑裘卫入门,立中庭,
北向。王呼内史赐卫戡市
朱黄、璆。
卫拜稽首,敢对扬
天子丕显休,用作朕文祖
考宝簠,卫其子子孙孙其永宝。^①

图 1-2

(二) 恭王时期

恭王时期大部分赏赐和册命铭文写作都遵循《廿七年卫簠铭》的写法,如《师酉簠铭》《七年趯曹鼎铭》《利鼎铭》《师盂父鼎铭》《卫簠铭》《十三年望簠铭》《史懋壶盖铭》《豆闭簠铭》《休盘铭》《十二年走簠铭》《师毛父簠铭》《申簠盖铭》《楚簠铭》《同簠铭》《应侯见工钟铭》等。

恭王时期最为多产的优秀铭文作家是裘卫,这一时期他创作了五篇铭文,加上康王二十年的鼎铭,此人有六篇铭文传世。《三年卫盂铭》记载了矩伯拿土地与裘卫交换瑾璋的事情。《五年卫鼎铭》记载了裘卫与邦君厉一次土地纠纷案件的解决过程。《九年卫鼎铭》记载了又一次与矩交易土地的过程。这三篇铭文均反映了当时的土地交易活动,是中华最早的记载土地交易和行政案件的文献。铭文叙事从容不迫,语带委婉,显示了铭文创制中塑造人物形象的能力。铭文还显示了裘卫对于获取土地的巨大热情。裘卫是王臣,聚集了大量财富,包括玉器、车马器,《三年卫盂铭》《九年卫鼎铭》均记载矩伯以土地换取瑾璋、赤琥、车马,我们不禁要问:裘卫这些巨额财富从哪里来的?铭文多次表明,裘卫的财

① 马承源. 商周青铜器铭文选[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3:124.

富受到周王朝的认可与保护。同样是王朝大臣,矩伯在经济上趋于没落,不得不动用采邑换取象征贵族身份的瑾璋和车马器。裘卫的富足、机警与矩伯的没落、经济上的失败形成鲜明的对比。铭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裘卫和矩伯这一对“经济人”的形象,王朝行政居然也显示了遵循经济法则的倾向,而这些在其他传世文献材料中闻所未闻。

这一时期留下两篇以上铭文的作家尚有小臣逋所作铭文两篇,师遽所作铭文两篇,史赵曹所作铭文两篇,棚生所作铭两篇,师望所作铭四篇,仲枏父所作铭两篇,效所作铭两篇,大多为杰作。百字以上的还有《伊簋铭》《询簋铭》《十二年永孟铭》《九年乖伯簋铭》《八祀师飏鼎铭》《师酉簋铭》《墙盘铭》等七篇重要作品,以二百八十四字的《墙盘铭》创作成就最高。

(三) 懿王时期

懿王时期的成篇铭文目前可以确定的有近四十篇,近一半为册命类铭文,写作结构遵循《廿七年卫鼎铭》所创模式,高度固定化,并在《廿七年卫鼎铭》基础上形成了“王若曰……王曰”模式。例如《询簋铭》,如图1-3所示。



询簋铭,《铭文选》245 器

图 1-3

王若曰：“师询：丕显文武，膺受天命，亦则于汝乃圣

祖考克尊佑先王，作厥

肱股^①，用夹召厥辟莫大命，盥和于政，

肆皇帝无昊，临保我有周，于四方民

亡不康静。”

王曰：“师询：哀哉！今昊天疾

畏降丧，乃^②德不克父，故亡承于先王。

向汝徂纯恤周邦，妥立余小子载乃事，

唯王身厚稽。^③今余唯申就^④乃命，命汝

惠雍我邦小大猷，邦有潢辞，敬明乃

心，率以乃友捍吾王身，欲汝勿以乃

辟陷于艰，赐汝矩鬯一卣，圭瓚，夷仆

三百人。”询稽首，敢对扬天子休，用作

朕烈祖乙伯同姬宝簠，询其万仞

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作州宫宝。唯元年二

月既望庚寅，王格于大室，荣入佑询。^⑤

图 1-3

铭文的主体部分当引自西周恭王时期史官撰写的《询令》。“王若曰”起领，“王曰”表示话题转换。此后繁式册命铭文均采用这种结构模式，我们认为这个模式是对《廿七年卫鼎铭》模式的突破。至于“王若曰”的写作学意义，我们在第五章第三节有详细论述。

这一时期出现了几个颇具个性的铭文作家，癸就是其中之一。癸在铭文创作上敢于创新，他流传下来的杰作包括一篇壶铭、三篇钟铭。其中三篇钟铭均为百字长铭，一改此

① 按：“肱股”，原拓片未拓出，可能是原器字残损，根据文义，此处当为“肱股”或“爪牙”。今从郭沫若说，暂补为“肱股”。

② 按：“乃”字马承源缺释，各家不能确定，于省吾、郭沫若以为“首”，但“首德不父”似乎不通。《康诰》有“乃德用父”，是正面赞扬，此为批评，因此推测此处可能为“乃”。

③ 按：“稽”原字马承源以为不识字，今暂定为“稽”。

④ 按：“申就”，原字当写作“𠄎𠄎”，册命铭文常见，裘锡圭等以为即“申就”，今从。后凡“𠄎𠄎”均写作“申就”，不再注出。

⑤ 马承源. 商周青铜器铭文选[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8, 3: 174.